

坚定的实践在场者与执着的理论探索者：

许钧的翻译批评实践和研究

Firm Practical Presence and Determined Theoretical Explorer: Practice and Research in Xu Jun's Translation Criticism

刘云虹 (Liu Yunhong)

内容摘要：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翻译活动能否科学有效地开展，翻译批评是一个关键因素。一直以来，翻译批评面临两大任务：在实践层面，翻译批评要时刻在场并介入翻译活动；在理论层面，翻译批评要不断推进自身理论建设。许钧长期关注翻译批评，是坚定的实践在场者，也是执着的理论探索者，为深化翻译批评研究、促使翻译批评彰显其应有价值做出了卓越贡献。探析许钧在翻译批评领域的行动与追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翻译批评的核心问题、把握翻译批评的根本诉求，从而通过批评的导向性和建构性力量，推动我国翻译事业健康、繁荣地发展。

关键词：翻译批评；许钧；实践介入；理论探索

作者简介：刘云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学与法国文学。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自设课题“翻译基本问题研究”【项目批号：24zhyxg00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Firm Practical Presence and Determined Theoretical Explorer: Practice and Research in Xu Jun's Translation Criticism

Abstract: Transl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and particula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ranslation criticism is one of key factors for whether translation activities could be carried out scientifically as well as effectively. For a long time, translation criticism has faced two major tasks: on the practical level, translation criticism should always be present therefore engaged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translation criticism should constantly bolster its ow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Xu Jun has long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translation criticism, as a firm practical presence and a determined theoretical explorer, he has made remarkable contributions to deepening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boosting translation criticism to demonstrate its awaited value. An analysis of Xu

Jun's actions and pursuits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is conducive for us to further revealing translation criticism's core issues and grasping its fundamental demand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nslation cause with translation criticism's leading and constructive power.

Keywords: translation criticism; Xu Jun; practical engagemen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uthor: Liu Yunhong, Ph.D.,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French literature (Email: ningyunhan@126.com).

翻译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社会发展、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翻译活动能否科学有效地进行,翻译批评是一个关键因素。然而,“批评”一词与生俱来的附属性和否定性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翻译批评的必要性,导致其理论与实践发展受到局限。翻译界之所以屡屡出现翻译质量低劣、翻译价值观和伦理观模糊等问题,翻译批评不力便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鉴于此,翻译批评及其面临的两大任务迫切需要译学界给予足够重视并加以深入思考:在实践层面,翻译批评要时刻在场并介入翻译活动;在理论层面,翻译批评要不断推进自身理论建设。作为长期从事翻译实践与翻译研究的学者,许钧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不仅呼吁要加强翻译批评,发挥翻译批评应有的作用,而且身体力行地介入翻译批评实践、探索翻译批评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积极互动中推进翻译批评研究。无论实践介入,抑或理论探索,许钧始终坚持明确的价值导向,从中外文化平等对话、共同发展的高度去认识翻译、评价翻译。笔者曾经对许钧教授的翻译批评实践与思考进行探讨,也曾以对话的形式同他就翻译批评问题展开交流,本文将着眼于许钧在翻译批评领域的所为与所思,力求更深入地理解一个具有强烈批评意识并勇于担当的批评者,也由此进一步揭示翻译批评的核心问题、把握翻译批评的根本诉求。

一、时刻在场,介入批评实践

有翻译,就必然要有翻译批评。许钧认为,翻译实践呼吁翻译批评,翻译批评对翻译实践的监督、评价和指导是翻译活动得以科学开展的必要保障。在专著《翻译论》中,他明确指出:“翻译批评的理性之光对于克服翻译实践的盲目性是不可或缺的,而翻译批评的伦理力量对于‘不健康的翻译道德’而言无疑是高悬着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396)。基于这样的认识,许钧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便积极介入翻译批评实践,围绕《追忆似水年华》等汉译经典发表“自然传神、刻意求工——《追忆似水年华》卷一汉译本简评”、“句子与翻译——《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长句的处理”、“形象与翻译——

《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隐喻的再现”、“风格与翻译——《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传达”等一系列评价文章、策划并组织《红与黑》汉译大讨论、就文学名著复译现象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与思考、深入研究傅雷的翻译作品与翻译追求、密切关注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语境中的中华文化译介等等。30多年来，许钧始终致力于翻译批评，是一个坚定的批评实践在场者。从他的在场与介入，我们看到，正如翻译实践不应是盲目的，翻译批评也必须成为一种有意识、有理性的活动，才能彰显其应有价值。

1、注重翻译批评的实践来源

作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基本纽带”（Newmark 184），翻译批评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与翻译有着密切关联。开展科学的翻译批评离不开翻译理论，正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促使翻译批评不断明确目标、拓展视野并逐步形成自身多元的方法论体系，同时，翻译批评也必须立足于翻译实践，以翻译实践为其来源和基础。就翻译实践之于翻译批评的重要意义，许钧指出，“翻译批评者应具有足够的翻译实践经验的积累，如果仅仅立足于理论层面对翻译的质量和价值加以评判，而缺乏对翻译过程中的种种选择与考量的真实体验、缺乏对影响翻译结果的文本内外诸多因素的深入了解，这样的翻译批评往往只能是‘隔靴搔痒’，难以令人信服，也无法真正发挥对翻译活动应有的指导与促进作用”（刘云虹 许钧，“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建构——关于翻译批评的对谈”2-3）。考察许钧的翻译批评实践，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始终以坚定的在场者姿态介入翻译批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首先是译者，是译著等身的翻译家。许钧共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经典著作30余部，代表性译著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卷四）》（1990）、波伏瓦的《名士风流》（1991）、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1992）、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1995）、雨果的《海上劳工》（1998）、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2003）、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2000）、贡巴尼翁的《现代性的五个悖论》（2005）等。这些翻译经验使得许钧对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了更为直观的体会、更为深刻的理解，构成其翻译批评实践的直接动因。在关于翻译批评的对谈中，许钧表示，“《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一书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翻译实践，如果我没有参加《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就不可能那么深切地体会到翻译普鲁斯特的困难，也不可能发现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有关翻译原则、翻译方法方面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可能对诸如此类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进一步加以思考和研究了”（刘云虹 许钧，“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建构”3）。确实，在《文学翻译批评研究》（1992）这部被学界誉为我国翻译批评研究“开山之作”的著作里，大半篇幅都针对《追忆似水年华》等经典作品汉译的分析与评价，内容涉及长句处理、形象再现、风格传达以及名著汉译不同版本比较、译本整体效果评价等方面。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从剖析翻译得失到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翻译

理论问题，书中所论无一不从实践出发，源自翻译过程中通过遭遇问题并力求解决问题而积累的实实在在的经验。

诚如许钧所言，“若没有亲身译事的经历，是很难真正感受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和问题的；若不了解对翻译活动起着制约作用的诸要素和翻译的可能性及限度，要对译家的翻译活动和他们的译作进行合理、公允的评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江苏社科名家文库·许钧卷》24）。可见，作为一种对象性活动，翻译批评必须从翻译实践出发，而批评者自身的翻译实践尤为重要。不管批评的路径、方法、目标存在怎样的差异，立足翻译实践都是翻译批评的必要基础，也是翻译批评科学性与有效性的根本保障。

2、密切关注翻译现实

“在场”是一切批评活动应有的基本属性，也是许钧在翻译批评实践中的积极追求。他深知，“批评者只有真正成为有意识的在场者，才能对翻译实践中凸显的各种复杂问题与现象有深入的认识，才能对引发译学界讨论甚至争议的问题有深刻的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翻译批评的价值才有可能得以展现，漠然和疏离绝对不是翻译批评者应有的姿态”（刘云虹 许钧，“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建构——关于翻译批评的对谈”3）。鉴于此，许钧自觉担负起批评的在场之责，秉持明确的介入态度，对翻译现实持续予以关注，积极推动翻译批评发挥其应有作用。

关注翻译现实，首先在于准确把握翻译实践的现状。翻译批评以保障翻译事业健康发展为根本任务，因此，翻译批评者必须对翻译实践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翻译领域掀起了一股外国文学经典名著复译的热潮，复译热中出现了译本粗制滥造甚至抄译、剽窃等不良现象。许钧敏感地发现这一现实情况，并觉察到这股复译热潮裹挟着尖锐的现实问题与复杂的理论问题，不仅事关译风、译德，更涉及文学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大问题。¹正是出于对那一时期翻译现实的深刻认识，1995年，许钧不失时机地发起并组织《红与黑》汉译大讨论，借助《红与黑》汉译这一典型案例，推动译学界就复译潮所折射的各种翻译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与反思。回顾来看，《红与黑》汉译大讨论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翻译活动的理解，也有力促进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2005年，许钧在《中国图书评论》发表《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一文，文章明确指出，尽管21世纪初我国翻译事业蓬勃发展，但译事昌盛的背后实则潜藏着重重危机，翻译领域存在如版权的盲目引进、翻译质量的多重失控、译风的普遍浮躁、翻译人才的青黄不接等诸多问题。直面这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许钧进一步分析指出，由于对翻译重大现实问题的某种麻木性、对具有倾向性的热点翻译问题的失语、对不良翻译现象缺乏应有的批评和斗争，翻译批评长期处于

1 参见许钧：《江苏社科名家文库·许钧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缺席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翻译危机的出现。¹由此，他强烈呼吁，“翻译批评应该切实担负起对翻译实践的监督、批评与引导的责任”（15），促进并保证翻译实践的理性开展。

关注翻译现实，也在于积极介入译学界普遍关注甚至有所争议的焦点问题。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译学界不断出现否定和批判严复“信达雅”之说的声音，有学者甚至认为学界对“信达雅”的推崇已经阻碍了中国翻译事业和译学研究的发展。“信达雅”是否过时的问题一度成为翻译学者们热议和争论的焦点。这不单关乎“信达雅”作为翻译原则和标准的合理性，更涉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译论的问题。对此，许钧于2006年在《中国图书评论》撰文，指出“信达雅”的生命力之强、影响度之广与译学界部分学者的摒弃论调形成强烈反差，值得译界深思，同时他认为，“‘信达雅’没有过时，关键在于要根据时代要求，注入新的活力，赋予新的内涵”（“‘信达雅’没有过时” 140）。2010年，许钧对翻译标准“信达雅”重新加以审视，深入剖析了“信达雅”在理论层面遭到的质疑、在实践层面产生的影响，并再度表明自己的立场：“对‘信达雅’的信奉不是盲目的，更不是所谓需要破除的‘迷信’，‘信达雅’说也并非虚无的神话，而是翻译实践中的切实原则和可靠支点。不仅如此，只要科学、理性地对待‘信达雅’说，它同样可以成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根纽带，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互动”（刘云虹许钧，“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基点” 18）。

关注翻译现实，还在于积极介入翻译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担负着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使命，中国文学与文化外译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译介方法与模式、文化传播路径、读者认同与接受等相关问题不仅激发译学界的热烈探讨，也引起了不同观点的交锋。针对这一重大的翻译现实问题，许钧以批评者的敏感和自觉，积极介入并深入加以思考。他围绕中国文学外译与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忠实于原文’还是‘连译带改’”（2014）和“文化译介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2017），在《中国翻译》《外国语》《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学术期刊发表的“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2010）、“关于加强中译外研究的几点思考”（2014）、“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2014）、“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关于《大中华文库》的评价与思考”（2015）、“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中华文化典籍外译”（2015）、“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及批评探索——兼评《杨宪益翻译研究》”（2019）、“关于深化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的几点意见”（2021），等等。同时，许钧在《小说评论》《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学术期刊主持“文学译介与传播”“中国文学外译研究”等专栏，推动译学界对中国文学外译与

1 参见许钧：“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中国图书评论》9（2005）：13-15。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涉及的翻译问题展开全面的思考与探索。此外，他还策划了对余华、毕飞宇、苏童、阎连科、池莉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访谈，通过作家与译学界的互动了解文学界对中国文学外译的真实想法，以助力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出去”。

3、坚持批评的价值导向

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评价活动，具有明确价值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评价主体是构成评价活动的核心要素之一。考察许钧的翻译批评实践，可以看到，于他而言，介入不仅是投身行动，更意味着价值与立场的坚守。谈及中国的文学翻译批评，就不能不提《红与黑》汉译大讨论，这次大讨论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翻译批评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批评事件，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在于其明确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导向。翻译是一种以语言转换为形式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文学翻译必然涉及文字、文学、文化三个维度。许渊冲认为翻译有文字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区别，主张应将文字翻译改为文学翻译，从而发挥译语优势，在两种语言文化的竞赛中取胜。¹郭宏安则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把文学翻译看作两种语言文化竞赛的译者实际上是置原作的风格于不顾的，也许他根本就认为原作没有风格，因为‘独特性’只为一入所有，是不能竞赛的”（159）。那么，三者的关系究竟该如何看待？对于这个问题，许钧的观点非常明确，在《红与黑》大讨论的阶段性成果《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的“代引言”中，他指出，“文字、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体现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应该是有机的、和谐的关系”（17），因此，“当我们读到带有‘欧化’倾向的西方文学作品时，不能简单地贬之为‘文字翻译’，也许这种翻译正是体现了一种传达异域文化、风俗、思维、审美的追求。而我们读到纯粹‘汉化’，不带一点翻译痕迹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时，我们也不要轻率地就褒之为‘文学翻译’，因为若过分‘汉化’，原作所蕴含的异国情调，所承载的异域文化，就可能被冲淡，甚至被取代了，就达不到交流的目的”（20-21）。基于这种文字、文学与文化有机融合的价值取向，许钧在《红与黑》汉译讨论中做了大量的组织、分析、评论、总结与理论引导工作，推动各方更深刻地理解翻译活动的层次、内涵和根本目标，对翻译实践发挥了积极的导向性作用，也有力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深化。

在关注中华文化译介这一翻译重大现实问题并展开批判性思考的过程中，许钧同样具有鲜明的价值意识，“以翻译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与共生这一价值取向为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标”（刘云虹，“对话与共生”79）。推进中国文学与文化译介，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与影响力的重要路径。在他看来，“翻译对外的深层次影响体现在价值观上，价值观的影响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种文化的影响”，因此，他呼吁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与

¹ 参见许渊冲：“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许钧编，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70-73页。

文化时首先要形成一种中国文化价值观，要把握好中国文化里最核心的内容，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以国外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一步步推介出去。¹同时，许钧特别注重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一贯主张翻译活动应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目标，切实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与对话，彰显其助力中外文明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根本价值。基于这样的立场，许钧多次指出，译学界应高度注意并警惕中华文化译介中的单向主义与功利主义倾向。如，针对长期存在的中国文学译出和外国文学译入失衡的现象，他认为，“译介工作要积极适应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形势，改变旧的以单向输入为主的文化交流模式，关注并推动中外文化之间的平等双向交流”（《关于翻译的新思考》62）。又如，针对翻译界和文化界在中国文学与文化外译相关探讨中表现出的某种急于求成的功利性心态，他指出，倘若“只从市场角度评价翻译作为一种工程项目的即期效益，而未从精神建构的角度衡量翻译作为一种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和发展的事业所产生的长远的历史影响，急功近利，必然会导致翻译焦躁症与市场决定论”（《关于翻译的新思考》7）。因此，他强调，译学界要以中外文化的平等交流与有效对话为根本目标来思考中华文化译介所遭遇的困惑和问题，在文学作品的功利性被接受与文化价值的真正被认识之间做出理性选择。

二、不懈探索，构建批评理论

笔者在《翻译批评研究》一书中曾指出，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引，翻译批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处于非理性状态，往往拘泥于“技”的层面的探讨，被局限在“挑错式”与否定性的评价中，甚至被简约为“好”与“坏”的评判，而科学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缺失导致翻译批评实践的开展难以令人满意，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无从体现。²可以说，翻译批评理论研究的滞后严重制约着批评实践的理性开展，也使其本该具有的作用得不到发挥。因此，加强自身理论建设是翻译批评内在的必然诉求。许钧深刻地认识到理论构建之于翻译批评的重要性，在介入翻译批评实践的同时，积极投身翻译批评理论探索。在国内外译学界，许钧都可谓首开文学翻译批评理论研究先河之人。他于1992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研究专著《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著作，在国际翻译批评研究领域，这部著作的问世也具有显著的开创性意义。许钧长期关注并从事翻译批评理论研究，除了上述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专论外，在《翻译论》（2003）、《翻译概论》（2009）、《翻译论（修订本）》（2014/2023）、《翻译概论（增订本）》（2020）等专著以及《翻译学概论》（200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2018）、《翻

1 参见许钧等：《翻译与翻译研究——许钧教授访谈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3-64页。

2 参见刘云虹：《翻译批评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译学概论》(2023)等编著中都辟有专章对翻译批评展开理论探索。在《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许钧直言无意做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而要从自己对翻译活动的基本认识出发,结合对具体翻译作品的评析,力求在探索合理、科学、公允地评价文学翻译的基本途径与方法上有所收益,促使译学界对文学翻译批评形成比较统一、系统的看法。¹这番话既表明许钧对于翻译批评理论探索的一份初心,也是此后30余年间他在翻译批评理论探索中的不懈追求。具体而言,他特别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1、从翻译定位出发,探索翻译批评理论

翻译批评以翻译活动为考察对象,通过实现翻译的价值而实现其自身价值。这就意味着,探索翻译批评理论,首先要对翻译进行定位,把握翻译的本质与价值。在《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这部极具探索性的翻译批评理论著作中,许钧关注的首要问题便是界定翻译的本质。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围绕翻译这项复杂活动及其必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探究,必须对翻译活动有深入的认识,而以往之所以在翻译本质上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见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在翻译理论研究中缺乏层次性的观点。²鉴于此,在展开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性探讨之前,许钧着力分析并揭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次:翻译的思维层次、翻译的语义层次和翻译的美学层次。他认为,具有全人类性的思维是翻译活动的基础,“当各民族的语言源起时,虽然处于各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活动则是一致的。正因为这一同一性,各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千差万别的情况下,才可互译”(2)。思维活动的同一性为翻译活动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思维的表达需要语言,翻译活动始终面临着用一种语言符号传达另一种语言符号之意义的任务,这就必然涉及翻译的语义层次。思维层次是语义层次的基础,语义层次是思维层次的体现,两者间有着密切关系。在对语义层次的论述中,许钧指出应廓清语义的范围,将语义分为语言意义和言语意义两个方面,如此方能“有助于我们最大限度地传达语义”(7)。语言除了传情、达意之外,还有其美学功能,因此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不仅有思维层次和语义层次,还涉及更高的层次,即审美层次。翻译审美层次的活动包括感受原作的美和传达原作的美两个维度。³通过剖析翻译的不同层次,许钧在理论上对翻译活动的本质进行把握,这一方面为定位翻译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实际上也为避免翻译及其批评活动的盲目性提供了根本保障,正如许钧所言,“一个成功的翻译不可能在一个层次完成,它应该是各个必要层次和谐统一的产物”(15)。

定位翻译,不仅在于把握翻译的本质,还在于明确翻译的价值。翻译也好,翻译批评也好,要得以理性开展,就必须立足于正确的翻译价值观。在

1 参见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第194-195页。

2 参见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第1页。

3 参见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第1-15页。

《翻译论》中，许钧明确表示“翻译批评活动应以一定的‘翻译价值观’为基础”，并坚持以价值为导向探索翻译批评理论：“我们在探讨中，首先强调以正确的翻译观为指导，探讨翻译的作用，以建立我们的翻译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再对翻译批评的理论问题，翻译批评的标准、原则与方法提出我们的看法”（23）。秉持这一原则，许钧从翻译活动所具有社会性、文化性、语言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本质特征出发，对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进行了深入考察与细致分析。翻译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于翻译活动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借助翻译，人类社会不断交流其创造的文明成果，互通有无，彼此促进。翻译的文化价值通常表现为跨文化交流中翻译对文化积累与拓展的积极推动作用，正是翻译，促使了各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拓展，在内涵上的丰富。翻译的语言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翻译活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既涉及语言本身的发展，也关乎语言变革带来的思想革新。翻译的创造价值体现在社会、文化和语言等多个层面，从社会角度看，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以交流为基础，交流有利于思想疆界的拓展，而思想的解放又构成了创造的基础；从文化角度看，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的作用；从语言角度看，为了真正引入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思想，翻译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语言的创造性转换。翻译的历史价值蕴含在翻译对人类历史发展所做的实际贡献中，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史，就会发现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翻译，都伴随着翻译的高潮；树立翻译的历史价值观，也意味着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活动不断丰富内涵和不断扩大的可能性。¹

从根本上讲，翻译批评就是对翻译活动的理解与评价，只有深刻把握翻译的本质与价值，才能对翻译进行科学定位，进而在其引导下开展翻译批评实践、探索翻译批评理论。这是许钧翻译批评研究中的自觉意识和明确追求。在这一点上，许钧与国际翻译批评领域代表性学者、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万·贝尔曼（Antoine Berman）可以说不谋而合。贝尔曼在构建其翻译批评理论体系时同样十分强调要深入认识和理解翻译活动，他在梳理翻译批评现状时对特拉维夫学派以社会批评为导向的批评模式进行了严厉批判，根本原因就在于该批评模式对“自治性”这一翻译本质特征缺乏深刻把握，从而以“翻译文学”的概念混淆了文学移植与其中中心时刻“翻译”之间的关系。²

2、立足批评本质，系统构建翻译批评基本理论

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但翻译批评的理论建设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来看，基本的翻译批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对翻译批评所涉诸多问题的认识都

1 参见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0-395页。

2 参见Antoine Berman,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95, 54-58.

比较模糊，这显然不利于翻译事业的发展。因此，许钧在翻译批评理论探索中始终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对翻译批评理论展开体系性研究，力求系统构建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理论。秉持这样的追求，许钧对翻译批评的本质、目的、原则和方法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持续探索。

从理论上探究翻译应如何科学开展，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翻译批评？”这个问题。结合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René Wellek）的观点，许钧对翻译批评的概念加以界定，提出“翻译批评就是‘理解翻译与评价翻译’”，并进一步指出：“从狭义上讲，翻译批评是对翻译活动的理性反思与评价，既包括对翻译现象、翻译文本的具体评价，也包括对翻译本质、过程、技巧、手段、作用、影响的总体评价”（《翻译论》403）。这一界定不仅肯定了翻译批评的理解、反思与评价性本质，也明确了翻译批评的对象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应包括翻译过程、翻译文本和翻译现象等多个方面。立足于此，许钧对翻译批评的目标也有清晰的认识，在他看来，翻译批评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对具体译作或译法作裁决性的是非判别，更在于对翻译活动何以进行、如何进行加以反思与检讨，进而开拓翻译的可行性，促进翻译活动健康而积极地发展，体现翻译活动具备的各种价值，真正起到翻译活动应有的作用”（《翻译论》403）。

翻译批评应避免盲目性，展现批评的理性力量，这就意味着翻译批评必须遵循科学的原则。在《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中，许钧指出，那一时期的翻译批评要么“过死”，满足于挑出译文的错误，要么“太活”，仅凭主观印象便对译文做出结论式评判。针对这两个值得注意的不良倾向，许钧提出文学翻译批评的四个基本原则：（1）文学翻译批评不仅要对翻译的结果进行正误性的判别，更应重视翻译过程的深刻剖析；（2）文学翻译批评要突破感觉的体味，注重理性的检验；（3）文学翻译批评应该将局部的、微观的批评与整体的、宏观的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4）文学翻译批评应该注意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建立起新型的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关系。¹这四条原则有很强的针对性，既指向翻译批评的基本理念，也涉及翻译批评的对象、视野和方法论，同时，在强调外部批评与内部批评的结合、倡导翻译批评的建设性等方面凸显出创新性的理论价值。在《翻译论》中，许钧进一步深化其翻译批评理论探索，在肯定以上翻译批评原则仍具有适用性的基础上，补充了另外两条重要原则：一是翻译批评要坚持历史发展观，对翻译现象、翻译事件和具体文本的批评要从历史出发，将之置放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二是翻译批评要坚持文化观，要有一种宏大的文化视野，从文化交流的高度去评价翻译史和具体翻译活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翻译选择、文化立场、价值重构等。²翻译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有着显著的历

1 参见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第38-40页。

2 参见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5页。

史性和文化性，重视翻译的历史文化属性与价值是许钧在翻译研究中持有的基本立场。强调翻译批评的历史发展观和文化观，这既体现了许钧翻译批评思想的新发展，也彰显出上文所论的其翻译批评理论探索的一个特点，即注重从翻译定位出发探索翻译批评理论。

翻译批评的有效开展离不开科学的批评原则，也依赖于科学、合理的批评方法。《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专门就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方法进行了探讨，许钧表示，翻译批评最基本的方法是比较，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翻译批评，应该基于客观的、合理的、科学的比较”（44）。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的批评活动中，面面俱到的比较与评价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强调批评者要依据批评的目的选择批评的点、面和层次以及批评的视角。这一点得以明确之后，许钧归纳了六种翻译批评界通常使用的批评方法：（1）逻辑验证的方法；（2）定量定性分析方法；（3）语义分析的方法；（4）抽样分析的方法；（5）不同翻译版本的比较；（6）佳译赏析的方法。¹不难发现，那一时期的翻译批评主要针对文本展开，从翻译批评的本质和目标来看，文本比较固然不可或缺，但正如许钧所言，“远远不是惟一的方法”（《翻译论》415）。故而，在翻译批评研究过程中，许钧一直有意识地拓展翻译批评的理论路径，积极探索并革新翻译批评的方法，卓有成效地推动了翻译批评理论的系统性构建。

3、理论与实践互动，革新翻译批评方法

翻译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创造性等多重本质特征，涉及语言、文化、历史、社会、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面对翻译展开批评，就需要不断开拓视野，探索多样化的批评路径与方法。这是促使翻译批评超越文本比较的局限，从而更具广度、深度和效度的必要条件，也是加强翻译批评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红与黑》汉译大讨论无疑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有益尝试。译学界普遍认为，这次大讨论在我国文学翻译批评发展历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在深化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促进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红与黑》汉译大讨论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它采用了具有创新性的批评方法。方法之新，首先在于读者问卷调查这一新颖的形式，如学者所言，“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获取读者反应的做法，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王东风 21）。1995年7月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刊载《红与黑》读者意见征询表之后，许钧所在的南京大学西语系翻译研究中心收到了来自各个年龄层次、文化层次的316位读者的反馈意见，“每个人都在调查问卷里呈明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尽管多是自发的经验积累和直觉指导下的漫谈，却恰恰为我们象牙塔里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层面”（许钧 袁筱一 89）。毋庸置疑，这样的收获正得益于问卷调查所架起的读者与翻译界之间沟通的桥梁。方法之新，更在于整个大讨论中明确的理论追求及其批评方法论意义。许

1 参见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第51-54页。

钩既是《红与黑》汉译大讨论的组织者，也是积极参与并有力推动讨论进程的批评者，他明确表示，“在有关《红与黑》汉译的整个讨论中，我们始终有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力图通过讨论，针对我国翻译界理论与实践往往相脱节的状况，以实际例子来说明两点：一是翻译是有理论的，而且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与观点；二是翻译理论是有指导性的，在不同的理论与观点的指导下，会有不同的翻译实践”（刘云虹 许钧，“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建构”6）。出于这样的理论追求，这次大讨论深入剖析《红与黑》翻译所凸显的问题，并由此拓展开去，以更为宽广的理论视野对文学翻译的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予以关注，如翻译方法与译者翻译观及文化立场的关系、翻译再创造的“度”、历史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翻译的风格、复译的伦理等等。通过对文学翻译基本问题、核心问题的深入探讨，《红与黑》汉译大讨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力发挥了翻译理论建构作用：第一，以代表性例证充分说明直译或意译不仅是翻译方法的选择，更是译者翻译立场的体现，具有丰富而深刻的伦理内涵；第二，将翻译置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揭示翻译活动各要素、各层次之间的复杂关系，强调文字、文学与文化三者的和谐统一；第三，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对不同译者的翻译观、语言文化立场和审美价值取向进行深入分析，直接推动了我国翻译研究的“译者转向”；第四，关注读者接受，以读者的真实反应检视译者翻译动机与翻译方法选择的合理性。从形式、内容与追求来看，这场大讨论都力求突破翻译批评中往往存在的一种“是否判别”的简单化思维，真正立足于翻译动态过程、翻译场域各主体要素的互动以及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考察翻译、评价翻译，凸显出鲜明的方法论意义。正鉴于此，《红与黑》汉译大讨论在国际译学界也产生了影响，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列入法国著名的“我知道什么”系列丛书的《翻译》一书在其“翻译理论”章节里专门论及这次讨论，将之作为当代翻译批评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典型案例加以介绍。¹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98至2000年间，许钧有针对性地与季羨林、萧乾、文洁若、叶君健、方平、赵瑞蕙、吕同六、杨武能、郭宏安等二十位在文学翻译领域卓有成就的翻译家进行交流，通过对谈的方式共同探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基本问题。2001年，访谈成果《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正如许钧在该书增订本的“再版序”中所言，这一系列访谈有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目的：在理论层面，通过学习、比较前辈优秀的译作，对文学翻译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基本问题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分析比较，进而上升到理性的思考，作出合理的、科学的描述和阐释，为认识文学翻译的本质、把握和处理翻译中面临的各种关系、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好翻译中的基本问题提供指导，同时对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系统、科学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在实践层面，与翻译家一起交流，以

1 参见 Michaël Oustinoff, *La tra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3, 64-65.

问题为中心，以他们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为基础，结合他们在实际翻译中所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对涉及文学翻译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索，进而挖掘他们的翻译思想，总结他们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为年轻的翻译工作者指路。¹这一目标凸显出系列对谈的批评性质，更承载着翻译批评在认识翻译活动、阐释翻译行为、引导翻译事业上不可推卸的责任。加拿大 *Meta* 杂志第 49 卷第四期发表了许钧与刘和平合作撰写的文章，题为“文学翻译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对这次讨论的理论追求与贡献加以详述。²无疑，我们再一次看到许钧在拓展翻译批评路径、革新翻译批评方法方面所做的探索，也再一次体会到他作为一个翻译批评者的强烈意识与敏锐洞察力。

结语

如季羨林所说，“翻译事业要发展，要健康地发展，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就不能没有翻译批评”（季羨林 许钧 4）。无论引导翻译实践的理性开展、保证翻译评价的科学性，还是为翻译活动拓展新的可能，都离不开翻译批评，同时，翻译批评还应与翻译理论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彰显其翻译理论构建功能。要实现翻译批评的多重价值，翻译批评者必须在强烈的责任感和批评意识的指引下，积极有效地介入翻译批评实践、系统地深入地探索翻译批评理论。在这个方面，许钧堪称一位先行者和引领者，他数十年关注翻译批评，为翻译批评建设做出了突出而宝贵的贡献。他的翻译批评实践与研究不仅在国内译学界和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国际译学界来看，也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奠基性意义。笔者曾经以许钧和安托万·贝尔曼这两位中西翻译批评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为例，梳理中西翻译批评研究的共性和特性，通过比较发现，中西翻译批评研究在共通与互补中呈现出一种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合力推动翻译批评研究。³

在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时代语境中，翻译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却也不断面临挑战，加强翻译批评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愈发凸显。对于翻译批评的未来发展，许钧特别强调批评要以问题为导向，关注翻译现实、坚守翻译价值。他在南京大学主办的《翻译研究》集刊开设“翻译观察”栏目，自创刊号开始每期撰文，提出值得译学界关注、探讨甚至警惕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每一次的“观察”，都诠释着许钧矢志不渝的追求：探索无止境，批评者永远在路上。

1 参见许钧：“再版序”，《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增订本）》，许钧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2页。

2 参见 Xu Jun and Liu Heping, “Expériences et théorisation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en Chine,” *Meta* 4 (2004): 786-804.

3 参见刘云虹：“中西翻译批评研究的共通与互补——以许钧和安托万·贝尔曼为例”，《中国外语》6（2020）：83-89。

Works Cited

- Berman, Antoine. *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 John Donne*.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1995.
- 郭宏安：“我译《红与黑》”，《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许钧编。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155-166页。
- [Guo Hong'an. "My translation of *The Red and the Black*." *Text, Literature, Culture. Studies o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Red and the Black*, edited by Xu Jun. Nanjing: Yilin Press, 1996. 155-166.]
- 刘云虹：“中西翻译批评研究的共通与互补——以许钧和安托万·贝尔曼为例”，《中国外语》6（2020）：83-89。
- [Liu Yunhong. "The Commonality and Complement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Criticism: Taking Xu Jun and Antoine Berman as an Example."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4 (2022): 72-80.]
- ：“对话与共生——试析许钧关于中华文化译介的思考”，《外国语》4（2022）：72-80。
- [—."Dialogue and Symbiosis: An Analysis of Xu Jun's Thought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Other Cultures Through Translation."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4 (2022): 72-80.]
- ：《翻译批评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Criticism*. Nanjing: Nanjing UP, 2015.]
- 刘云虹、许钧：“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基点——翻译标准‘信达雅’实践再审视”，《中国翻译》5（2010）：13-18。
- [Liu Yunhong and Xu Jun.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nd Practical Applicability: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as Translation Criteria in Ac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5 (2010): 13-18.]
- ：“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建构——关于翻译批评的对谈”，《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4（2014）：1-8。
- [—."Translation Critic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n Interview with Xu Ju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4 (2014): 1-8.]
-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London: Prentice Hall, 1988.
- Oustinoff, Michaël. *La traducti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3.
- 王东风：“‘《红与黑》事件’的历史定位：读赵稀方‘《红与黑》事件回顾——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话之二’有感”，《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2011）：17-23。
- [Wang Dongfeng. "Siting 'the *Le Rouge et le Noir* Investigation Event': Reflections on Zhao Xifang's 'A Review of Dispute over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Stendhal's *Le Rouge et le Noi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4 (2014): 1-8.]
- 许钧：《江苏社科名家文库·许钧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 [Xu Jun. *Collected Works of Jiangsu Maestros in Social Sciences: Xu Jun*.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中国图书评论》9（2005）：12-15。

- [—.“The Crisi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Criticism.” *China Book Review* 9 (2005): 12-15.]
- ：“‘信达雅’没有过时”，《中国图书评论》8（2006）：78-80。
-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Are Not Outdated.” *China Book Review* 8 (2006): 78-80.]
- ：《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
- [—.*The Lightness of Life and the Heaviness of Translation*.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 ：《关于翻译的新思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
- [—.*New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Hangzhou: Zhejiang UP, 2020.]
- ：《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On Translation*.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2003.]
- ：“再版序”，《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增订本）》，许钧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Dialogues on Translation (Revised Edition)*, Xu Jun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10.]
- ：《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
- [—.*Research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riticism*. Nanjing: Yilin Press, 1992.]
- ：《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
- [—.*Text, Literature, Culture: Studies o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Red and the Black*. Nanjing: Yilin Press, 1996.]
- Xu Jun and Liu Heping. “Expériences et théorisation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en Chine.” *Meta* 4 (2004): 786-804.
- 许钧等：《翻译与翻译研究——许钧教授访谈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 [Xu Jun, et al.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Collected Interviews with Professor Xu Jun*.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8.]
- 许钧、袁筱一：“为了共同的事业——《红与黑》汉译读者意见综述”，《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许钧编。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88-100页。
- [Xu Jun and Yuan Xiaoyi. “For the Common Cause—Review of Readers’ Opinions o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Red and the Black*.” *Text, Literature, Culture. Studies o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Red and the Black*, edited by Xu Jun. Nanjing: Yilin Press, 1996. 88-100.]
- 许渊冲：“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许钧编。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70-73页。
- [Xu Yuanchong.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Text, Literature, Culture. Studies o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Red and the Black*, edited by Xu Jun. Nanjing: Yilin Press, 1996. 70-73.]